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启示

梁 柱

(北京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

摘要: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培育和影响了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进步思想界,李大钊不仅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且努力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卓越见解。李大钊首先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和事业,他留下的丰富的思想理论遗产,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世景仰、学习和继承的。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1-0006-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1.002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of Li Dazhao's Spread of Marxism

LIANG Zhu

(Research Cent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as a great pioneer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spread Marxism, trained and influenced a generation of Communists, and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vic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1917 inspired the Chinese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circles. Li Dazhao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revolution should be guided by Marxism and Leninism, strived to apply them to analyze the basic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revolu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enlightening suggestions. Li Dazhao pioneered the Chinese Marxist cause, leaving much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heritage. In short, his heroic dedication to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is to be remembered, admired and carried on.

Key Words: Li Dazhao; Marxism-Leninism;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自从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就开始零星地介绍到中国来;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对此做了较多的工作。那么,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论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呢?这是因为,这时“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

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①。这就是说,有了实践经验,有了鲜明的对比,因而这时开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已不仅作为一种学说加以介绍,而是为即将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准备了思想条件,并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培育和影响了一代共产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这方面的的工作给后人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

由爱国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再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反映了近代中国一部分先进分子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前进的历史轨迹。李大钊便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李大钊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开始步入政治舞台的。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卓越战士和主将之一,积极投身于这场超越辛亥革命深度的反封建思想斗争。李大钊在五四前期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中,就清晰地反映了他从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并逐步成熟的过程。可以看到,在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中,已经显露出他兼有思想家的锐敏深邃和战士的勇猛无畏这样两种品格。他的思想文章以其独树一帜的深刻见解,以及气势恢宏的独特风格,为这一时期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增添了战斗性很强的内容和新鲜的气息,与他后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有重要的关系。

应当说,李大钊早期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思想,与同时代的革命民主派相比较而言,他们之间都存在某些共同的不彻底性,然而就其主导的方面与一般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相比较,又确有其自己突出的、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李大钊更加注重实际,特别是政治上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就以敏锐的洞察力,最早揭露了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出现的“假共和、真专制”的政治局面,愤怒地指出令人扼腕浩叹的现状:“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面目暴露之后,他立即投入维护共和的实际斗争。他深刻分析了专制制度是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源,发出了“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再造青春之国家”的战斗号召。他深刻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明确表示:“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

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①这铿锵有力的语言坚定地表达了根除封建专制、维护民主共和的决心。其二,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李大钊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实际斗争,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了有一定深度的分析。它针对日本1915年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痛切剖析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一贯国策,“大欲难填,野心不死”,“二十一条就是使我断绝根本复兴之生机”的明证。他在深入揭露日本亡我野心及其既凶残又阴险本性的同时,还缕析了西方列强各国分割中国的态势,特别指出,列强之于中国,如同虎狼扑食,如若图一时的牵制,取“引狼拒虎”的政策,丧权辱国的痛史“势又缘兹以起,且至不可收拾”^②。这是对近代中国一个重要历史教训的深刻说明。其三,李大钊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曾用唯民主义这一提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说:“恶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诚可痛,亦宜亟谋所以自救之道。”他把反侵略斗争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的奋起自救,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他深信:“光明缉熙之运,唯待吾民之意志造之,唯赖吾民之实力辟之。”^③表现了对人民群众力量和奋斗必胜的信心。其四,他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因素。李大钊在探求真理和参加实际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初步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宇宙是客观存在的,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④,而“旧的毁灭”和“新的再生”是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法则。基于这样的观点,他坚信“青春中华”必将代替“白首中华”,青年应“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⑤。正是这种闪烁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思想,指引并鼓舞了青年走向积

①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63页。

② 同上,第116、133、111—112页。

③ 同上,第138、134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极的、进取的人生道路,献身于民族的解放事业。

由上表明,李大钊早期思想所达到的深度,无疑是超越了同时代的进步分子,但是,他这时还不可能超越历史所能提供的舞台,这就是说,他仍然是以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取向的。比如他在这时热烈追求的民主政治,如他自己所说:是“唯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①,即追求的仍是以代议政治为特征的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而他的唯民主义主张的主体,还是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②。即把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如果说,李大钊早期思想上的积极因素大大超过了他的前辈,那么,他的政治主张则没有增加多少新的东西。他在这时孜孜以求的“青春的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还是比较空泛的,它的实际内容也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唯一可供中国人选择的出路,这是一种历史的现象。

问题在于,历史已经表明,近代的中国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机遇,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流产就是有力的证明。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李大钊的政治视野不能不受到这种历史的局限。比如,他从争取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出发,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然缺乏清醒的认识,他曾认为像日本这样的“官僚政治”国家具有对外侵略的本性,而像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国家则不会向外侵略,以至赞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还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公理、正义等口号,赞扬为“平和的曙光”;又如,他猛烈抨击了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假共和、真专制”,但对“民权旁落”的原因还主要看作是“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而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阶级本质缺乏深刻认识,一度把袁世凯的死看作是“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③;再如,他提出“再造青春中华”的积极主张,但找不到实现的正确途

径,他虽然向往革命的变革,但又倾向以改良的方法即从教育入手实现民权,认为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等等。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在评论法国启蒙思想家时所指出的:“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④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先进分子身上也表现得更明显。李大钊在政治上对西方民主的热烈追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观。他在 1914 年就曾无限感慨地说:“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能,谋遏洪涛,昌学而已。”^⑤而当 1917 年张勋再演复辟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王国梦幻的破灭而失望,发出了“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的慨叹。这确是表现了当时一般先进分子的心态。当然,在这种失望之中,既反映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结局的完全失望,也体现了他们经过对民主自由的呼唤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在这种失望和苦闷之中,蕴含着对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李大钊最早实现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是同他早期思想中积极的、活跃的因素,不妥协的、彻底的战斗精神、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是紧密相关的。而且他勇于追求真理,不保守自己已有的认识,对西方事物不采取盲从的态度。他曾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⑥表示了一定的怀疑和保留。这样,在十月革命爆发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他的转变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本来,社会主义对中国先进分子来说,还只是一种书本上的东西,陈独秀在 1917 年初还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唯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⑦现在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一个大国

① 《李大钊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9 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1 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3、17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56 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2 页。

⑥ 同上,第 158 页。

⑦ 《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

成为现实,这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人类历史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启迪了他们对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浓厚兴趣。于是,他们开始学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

所以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进步思想界,李大钊首先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二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②这深刻说明了五四时期在众多新思想涌入中国的情况下,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成为指导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深刻说明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具有这样理论威力的内涵和品格。在李大钊早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中,就表现了上述这样的特点。

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不仅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且努力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正因为这样,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作用,对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卓越见解。

首先,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敏锐地指明从此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初步把中

国革命同这个新的世界革命连接起来。中国人民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介绍的。因此,如何认识和对待十月革命,就成为检验是否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试金石。这时,全世界一切反动势力都加入了咒骂、围攻十月革命的行列,中国的报章也同样充满了“布尔什维克之阴谋”“过激派阴谋”“过激派侵入之危险”等耸人听闻的报道。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独树一帜,于1918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集中阐述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时代精神。他明确判定处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法俄革命的迥然不同的性质,认为正是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他预言:“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他强调对于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我们的态度“唯有翘首以迎”,“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③。他还进一步对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俄国革命所展示的基本内容。这主要是:指出指导这个革命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它“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指出这个革命的目的是要“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④;指明这个革命依靠群众运动的力量,认为这种20世纪的群众运动必将战胜一切反动势力而取得胜利。正是从上述认识出发,李大钊把十月革命比喻为“惊秋之桐叶”,“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并从这个新的革命时代中看到建造新的中国的一线曙光。他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⑤。在他以后的论述中,则更加明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② 同上,第1515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227页。

④ 同上,第260页。

⑤ 同上,第268页。

分”^①,即新的世界革命一部分。在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这时的民主主义已不再是法国革命时代的旧民主主义,而是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相联系的新的民主主义。虽然早期共产主义者还不能科学地区分中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步骤,往往把社会主义作为直接争取的目标,但是对于历史时代发展的正确说明,表明中国革命已有了新的取向。

其次,把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从感性推进到理性阶段,深入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联合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从而把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同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中国民主革命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但在一个长时期内中国先进分子却没有能够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在反帝斗争中,或是采取单纯排外的错误做法,或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近代中国革命惨痛的历史教训都同这个带根本性的缺陷相联系的。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由感性进到理性的阶段,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普遍迷惑于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庆祝英美等协约国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了这次大战的真正原因,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②,从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上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1919年1月,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准确地表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它是与民族自决主义直接对立的。他明确提出了“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即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的斗争任务。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李大钊明确指出不能只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要求撤换几个亲日派官僚,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分赃活动,已经彻底撕去了它们所谓的人道、正义、和平的虚伪面纱,它们的行为证明“现在世界,还是强盗世界”,“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

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引导爱国运动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整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明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接起来。随后,他还深刻地指出当时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③,形象地揭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统治者之间的主仆关系。

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李大钊深刻总结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一方面,要不畏惧帝国主义,不轻视“民众势力”。他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阔,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权威,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另一方面,要认清“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对它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强调:“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④这里所揭示两个对待帝国主义的正确原则,是只有在透彻认识帝国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的,这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在理性和策略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者,阐明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革命思想,为民主革命指明了崭新的发展方向。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热情讴歌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表现出来的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认为这是滔滔滚滚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特别指出今后人类发展的前景必将是“劳工的世界”,并在1919年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文章中就预测了中国工人运动必然会发展起来。他充分肯定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指出无产阶级身

①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③ 同上,第270、339、341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8页。

受的压迫是极为深重的，他们既受本国资本家又受外国资本家的压榨，“他们这种受他国资本家间接压迫的影响，比各国无产阶级受他们资本家直接压迫的影响还要厉害”，因而具有坚强的反抗精神。李大钊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作用坚信不疑。1927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有的人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前途表示悲观，对工人运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李大钊持相反态度，他从这次罢工中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坚定地表示：“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正是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精神“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①，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同时，李大钊还极为重视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同那种所谓农民“保守”“散漫”“难以加入革命”的错误估计相反，他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②由此可见，李大钊充分肯定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断定“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③。他还阐发了人民群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观点，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④由于李大钊这时已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彻底抛弃了要以中产阶级为中心势力的旧观点，因此他开始用平民主义或平民政治代替资产阶级的代议政治的旧提法。这就是说，他要求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他在论述平民政治时，就尖锐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明确指出：“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⑤这表明，李大钊这时所指的平民政治，已经是同资产阶级民主相对立的，而同社会主义民主相联系的人民民主政治。

最后还要指出，李大钊在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多方面的介绍，以及运用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他在这方面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文章，并且在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他这样做，是适应了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反映了进步思想界的要求。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那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大体上是拥护唯物论的，但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他们则仍然停留在进化论、唯心论的认识水平上。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历史，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竞争说看作是适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庸俗进化论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中国先进分子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能正确理解自强与反帝、渐进与革命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上的根源。这种情形，直到中国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后，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李大钊作为在我国传播并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驱，他努力运用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廓清思想界浓重存在的唯心史观的迷雾，并运用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变革和发展要求，考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不仅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发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创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他使先进分子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国家的出路。李大钊曾描述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

①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85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⑤ 同上，第86页。

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①就生动地反映了上述两方面的情形。

三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电传真”。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对李大钊的赞美诗,生动地反映了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他处在通往新中国的重要起点,功高至伟。李大钊首先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和事业,在他短促的生命里留下的丰富的思想理论遗产,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世景仰、学习和继承的。在新中国诞生六十多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今天,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仍然会给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所体现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李大钊始终是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寻求救国的道路。当他从理论和实践的比较中,深切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以后,就迅速地抛弃了旧的民主主义的观点,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把这一崇高理想内化而成为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这种奠定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科学的信仰。它不同于虚幻的宗教信仰,也不同于一切怀有私利的世俗信仰。李大钊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选择这种科学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备受列强欺凌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是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爱国主义也更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爱国主义的理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备受列强欺凌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是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有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怀也更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爱国主义的理想。同时,李大钊这种由爱国主义通向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也是扎根于对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忠诚与眷念之中,他心中唯有人民群众的解放,愿为人民群众的解放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包括自己的生命。无数事实表明,一个人心里装的是人民群众,愿意为他们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他们谋利益,就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如果一个人心里装的只是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就会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科学。选择这样的理想信念,就意味着要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准备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也就会具有像李大钊这样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李大钊在建党初期就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会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方能冲过去的。崇高的理想信念会使人无私无畏,使我们能够“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②③}。在理想信念严重缺失的今天,是多么需要继承和发扬李大钊的革命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有坚定不移的正确认识,在科学理论上牢固地树立起我们的理想信念。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所体现的学者与战士这两种完美结合的品格。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伟大理论家的李大钊,他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传播和研究革命真理并终生为之奋斗,因而他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而且首先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战士。在他身上体现了学者和战士这样两种品质的完美的统一。他无私无畏,勇于实践,认定要“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他不仅倾情传播真理,而且满腔热情地投身实际斗争,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并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国民革命运动和军事运动。他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激励青年的战斗激情:“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你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④正是这两种品格和谐统一所体现的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使李大钊成为进步青年的亲密朋友和敬爱的导师,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创

①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1 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14 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1 页。

立时期的许多早期党员，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李大钊的影响。曾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林伯渠回忆说：“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间，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①林伯渠后来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1918年8月，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半年，与李大钊朝夕相处，直接受到他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②李大钊严以律己，诚恳待人，助人为乐；他平常“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衣”，而却把薪水的大部分资助贫寒学生和党的活动经费。在事业上，他更是对青年关怀备至。一位同时代人后来回忆李大钊时曾深情地说：“我们把他当老大哥看待，大家把他视为道德上的最高典范。”^③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后，受到了敌人的严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气节凛然。在敌人法庭上，他侃侃而谈，宣传革命真理，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无限忠贞和革命英雄气概。他严守党的秘密，尽一切努力保护同志。他被捕和英勇牺牲后，北方区委所属七个省的党组织没有遭到任何破坏。李大钊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精神彪炳日月，光照天地。他书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条幅的深刻内涵，正是上述两种品格和谐统一的生动写照，也是他革命一生的生动写照。这种精神和品格，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的。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所体现的优良学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众所周知，欧洲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故乡。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来运用这个理论，就是要在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社会条件下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一个困难而又特殊的任务。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反对者几乎从来就众口一词地宣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出激烈的争论。由于五四

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使持改良主义见解的胡适“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他于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发难。他所持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必要性，否定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由此出发，他声称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思想懒惰的表现，只起了“鹦鹉和留声机”的作用。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李大钊发表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给予了明确的反驳。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旗帜，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对中国革命同样是适用的。同时，他又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的，“研究实际问题”和“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正是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和各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因而能够对中国革命发挥它的指导作用。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万古不变的教条，他强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还告诫人们：不要“偏于纸上空谈”，而应该“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④。在这里，李大钊初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重要的思想，为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并为后来形成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培育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斯人长逝，精神永存。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当永远记住李大钊的英名。

（责任编辑：白丽娟）

① 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

② 爱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2页。

③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7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